

被审计单位数字并购对审计费用的影响

李明¹, 王卫¹, 左静静²

(1.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北京 100142; 2. 河南大学 商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 数字并购作为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获取的重要途径, 具有数字革新价值与相应风险, 并由此对审计工作产生影响。选取 2009—2022 年中国 A 股非金融上市公司并购事件为样本, 以审计费用为切入点, 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并购如何影响审计工作与定价决策。研究发现, 被审计单位数字并购显著提升审计费用, 在考虑内生性与稳健性问题后依然显著。机制检验发现, 数字并购行为会显著增加被审计单位的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 审计师会相应增加审计投入, 从而影响审计定价决策。异质性检验发现, 当被审计单位为数字经济企业、高管团队具有数字背景、聘请国际“四大”事务所审计以及审计师行业专长较高时, 数字并购对审计费用的正向影响不显著。研究从审计费用视角探讨了企业数字发展的“另一面”, 完善了数字并购的风险与成本研究, 丰富了现时审计体系在数字情境下的革新性研究。

[关键词] 数字并购; 审计费用; 数字技术; 数据资源; 固有风险; 控制风险; 审计投入

[中图分类号] F239.4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4833(2025)02-0041-11

一、引言

近年来, “大智移云物”等数字技术驱动数字经济纵横推进, 已成为重塑现代产业体系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对于企业而言,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关乎生存与发展的“必修课”。然而许多企业在实际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依旧困难重重, 依靠自身技术知识储备很难路径嬗变并对企业竞争力产生有效促进。为此, 许多企业逐渐偏向依赖外来能力作为“跳板”, 通过并购与自身数字发展战略相契合的数字型企业, 快速且有效地获得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 增强自主发展能力, 从而化解企业数字化转型窘境。对于这类以数字资产与数据要素为主要并购目的的并购, 现有研究将其定义为“数字并购”^[1-2]。在数字经济背景下, 数字行为对企业的影响范围广泛且程度深, 为会计、审计等企业内外财务工作者均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3-5]。面对数字并购战略行为, 企业特征会发生何种改变, 进而影响审计师工作及审计定价, 这构成本文研究的逻辑起点。

作为企业数字发展的重要途径, 企业并购数字型标的获取数字能力相较于内源式有机发展具有“快速性”与“外源性”特征^[2]。数字并购与传统并购存在较大差异, 传统并购研究并未区分并购标的行业领域, 而数字并购标的主要集中在数字行业^[6], 是企业为建设自身所需数字能力而进行的并购, 强调数字业务的拓展和数字能力的构建, 进而转变模式以适应数字颠覆^[2], 具有跨界融合特性。因此, 数字并购在具有控制权转移和企业合并业务特征的同时, 强调数字属性特征。基于数字技术与数字资源获取动机, 数字并购大多针对数字行业中有市场潜力但尚未发展成熟的企业^[6], 标的企业价值提升相对困难并寄希望通过并购最终变现。企业通过数字并购可以获取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1], 从而实现企业创新、数字化转型和市场势力的提升^[6-8]。而从标的企业看, 数字并购能够助推标的企业价值与估值上涨, 并在主并方资本扶持下进一步放大资本扩张步伐, 实现“赢家通吃”^[2]。

然而, 数字并购是企业战略层面的重大调整, 数字并购会引入外部数字型企业的战略模式, 进而对企业原先连贯稳定的组织系统产生一定冲击, 给企业经营带来不确定性。现有研究基于外部数字能力获取渠道, 在数字控制权转移和企业合并业务特征方面着墨较少, 忽视了伴随数字并购革新价值的风险对组织经营造成的冲击与挑战。根据数字并购特征, 并购标的多为有市场潜力但尚未成熟的初创企业, 并购“套牢”风险较大。尤其是数字并购核心产出之一的数据要素超出了现行会计方法体系下的核算与反映边界, 数据作为一项资产进行确认、

[收稿日期] 2024-08-30

[基金项目] 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 BC 计划(C 档)(GZC20230679)

[作者简介] 李明(1966—), 男, 安徽芜湖人,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博士, 从事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审计理论与实务研究; 王卫(1990—), 男, 河南漯河人,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从事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资本市场审计监管、数字创新与公司治理研究, E-mail: david071019@163.com; 左静静(1993—), 女, 河南济源人, 河南大学商学院讲师, 博士, 从事非正式制度、公司治理与审计研究。

计量、记录、报告仍缺乏充分可靠的条件。数字型企业投资于数据资源积累、挖掘的资源均被费用化处理,其价值类似于自创商誉,无法确认计量为资产,这降低了企业会计利润和资产科目的信息含量,从而使其会计信息不能充分反映出并购标的的真实价值。主并企业通过并购资产与资产交换、股权与资产交换等控制权转移的方式获取隐藏在企业报表中的数据要素时,可能需要支付更高的交易对价,从而形成超额商誉,影响主并企业的盈利能力与财务风险。同时,大数据、区块链与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也可能给企业带来更大风险^[4-5]。对这些数字型企业进行合并有助于形成平台化的商业模式与数字生态赋能的同时,也会打破组织经营惯例、模糊组织主体边界、加速人员流动、影响内部控制环境等,从而致使内部控制设计与运行有效性不足。

企业风险与内部控制有效性不足会增加审计的固有风险与控制风险。为将审计风险控制在此可接受的低水平,审计师往往会扩大审计范围,增加努力程度,执行更多的审计程序,进而导致审计成本与费用提升。为细化检验企业数字并购与审计费用的实然状态,本文选取2009—2022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并购事件为样本,实证检验被审计单位数字并购是否及如何影响审计师工作与定价决策。

本文可能的贡献有两点:一是提供了数字经济情形下企业数字并购战略行为对审计工作影响的实证证据。作为会计信息由内向外流转过过程中的“看门人”与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审计师的反应是认识数字变革影响的可靠视角。随着数字经济的广泛发展,数字并购有效融合了数字技术、数据要素和商业模式,成为并购重组的一种新型模式与企业数字变革的重要途径。然而,由于数字并购研究方兴未艾,关于其对审计工作的影响还未曾涉及,理论研究未有效反映实践发展。本文基于数据资源、数字技术的控制权转移与企业合并特征会引发一系列风险与内部控制缺陷而立论,研究发现审计师能够识别应对相应风险并收取较高审计费用,从而拓展审计费用的影响因素边界。二是从审计工作成本视角拓展了企业数字并购的经济后果,为辩证看待数字并购的成本与收益权衡提供了有益证据。已有研究肯定了企业数字并购的积极作用,但鲜有研究探讨“硬币的另一面”。基于审计师审计定价视角,能够具象数字并购这一具有变革性质的战略行为对于企业系列风险的冲击影响,有助于更加全面系统地理解数字并购的经济后果。

二、文献综述

(一)数字并购的经济后果

针对企业数字并购的研究不多,且现有研究偏重于经济后果,主要集中于企业创新^[6-7]、产品市场绩效^[8]、全要素生产率^[9]以及资本市场价值创造^[10]等方面,认为数字并购能够通过知识协同、财务协同、人力资源结构优化等途径对主并企业生产经营与商业服务产生赋能效应。方森辉等立足数字技术的特征,从并购双方知识协同与财务协同两个机制研究了数字并购对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影响^[6];唐浩丹等认为数字并购通过数字技术、生态与人员,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优化人力资源结构和提升生产性服务要素占比等途径,对企业市场势力提升有降本、增效与提质的作用^[8]。同时,相关学者也从数据要素视角深入揭示了不同类型并购影响数字平台市场绩效的内在经济逻辑,以平台为并购主体的数据驱动型并购能够通过“数据规模效应”对企业经济绩效产生积极影响^[11],为数字平台如何基于数据规模、数据范围和数据网络效应选择并购策略提供了参考依据^[12]。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数字并购具有积极作用,而李双燕和乔阳娇则以人力资本升级成本在企业数字并购创新效应中的作用机制揭示出数字并购对企业而言是把“双刃剑”,认为数字并购人力资本成本压力的不完全转嫁和数字资产的溢出效应会导致企业垄断势力降低^[13]。这意味着通过并购获取数字资源对企业而言具有一定风险与成本,从而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契机。

(二)审计费用影响因素研究

自Simunic于1980年从经济学角度构建审计定价理论模型^[14],为审计费用相关研究奠定基础后,众多学者以此展开并延伸相关研究,取得了系列成果,从被审计客体、审计主体与制度环境三个层面拓展了审计费用的边界影响。首先,从被审计客体来看,相关研究主要考察了高管特征^[15]与连锁董事^[16]等公司治理状况,生物资产^[17]与会计信息质量^[18]等对审计费用的影响。除此之外,相关学者也从被审计客体的其他特征进行了研究。如李秀丽等从创新风险与创新价值的辩证关系切入,分别从创新成本、创新风险与创新收益三个维度验证了企业创新对审计成本效应、风险效应和信息效应的不同影响^[19];黄世忠等使用供应链工商大数据度量隐性关联关系,发现上市公司与重要交易对象之间存在隐性关联关系,并提高了审计费用^[20]。其次,从审计主体来看,事务所声誉^[21]与审计师行业专长^[22]等基本特征,审计市场供求关系^[23]与审计师变更^[24]等交易特质都会对审计费用产生影响。同时,蔡

春等证实了并购审计师与年报审计师具有相近网络中心度的匹配关系可以使得年报审计师给予主并购方审计折价优惠^[25]。最后,从外部制度环境来看,国家审计^[26]、审计准则修订^[27]以及新收入准则的施行^[28]等正式制度与审计费用息息相关。非正式制度方面,竞争环境^[29]与媒体报道^[30]也能够显著影响审计费用。

在数字经济纵横推进的背景下,学者们相继从数字特征视角开展了诸多研究并形成了系列成果,如大数据与区块链^[5]、人工智能^[31]等。张永坤等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会对公司治理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并从公司经营、信息披露质量与审计效率三方面验证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降低审计费用的赋能效用^[32]。杨德明等、王稳华等与吴武清等则认为,大数据和移动互联网、区块链以及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会提高审计重大错报风险,致使审计费用提升^[5,31,33]。可见,数字化发展是新时代情境下影响审计费用的重要因素且两者之间的关系尚有悖论。而产生悖论的原因可能在于已有研究中数字无形资产占比法与文本分析法等企业数字化发展指标构建存在评价指标过于单一与“言行不一”等不足,不能充分且可靠地反映企业数字投资与发展的真实状况,使研究结论存在幸存者偏差。数字并购是对数字型企业标的重新确权的购买行为。相对于企业内源式有机发展,标的所有权的转移和企业合并势必会通过会计确认与计量活动对数字技术与数据要素进行有效反映。以数字并购作为企业数字投资与发展的表征,能够缓解数字发展指标构建不足及其对审计费用影响的幸存者偏差。

(三)文献述评

现有研究虽然肯定了企业数字并购中数字特征的价值,但针对数字控制权转移和合并业务特征给关键利益相关者带来的风险与挑战仍关注不足。企业数字并购获取数字技术业务相比内源式有机发展具有“快速性”与“外源性”特点,会在对企业业务模式带来变革的同时影响控制系统的有效性。尤其是由于现时会计准则体系下的会计要素及计量方法还未能全面、客观地将符合决策有用要求的核心数据要素“进表”,故现有文献并未凸显数据资源价值。而企业通过外来途径合法获得这些数据资源时,通过并购交易与控制权转移能够具象数据资源价值,并通过商誉形式进行披露。审计师作为企业的关键利益相关者,面对企业数字并购产生的风险,是最先受到冲击的外部信息使用者。本文基于风险与成本导向的审计决策视角,将数字并购价值分为数字技术价值与数据资源价值,探讨被审计单位数字并购对审计的影响,有助于丰富数字并购的风险与成本研究。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根据 Simunic 审计定价理论模型,审计费用是审计投入和审计风险溢价的综合反映^[14]。而审计风险是由重大错报风险与检查风险决定的^[34]。其中,重大错报风险是财务报表在审计前存在重大错报的可能性,与被审计单位的风险与内部控制有效性息息相关^[35]。当企业风险较大、内部控制有效性不足时,重大错报风险较高。为将审计风险降至可容忍水平,审计师往往会付出更多努力、扩大审计范围、执行更多审计程序,将风险控制可接受的范围内,由此导致审计成本与费用提升^[36-37]。

1. 数字并购会引发更高的企业风险,增加企业账户、交易类别等发生重大错报的可能性,提高审计的固有风险水平。为将审计风险控制可接受的低水平,审计师需要增加努力程度,实施更多的审计程序,从而导致审计成本与费用增加。一方面,数据资源费用化处理使数字并购相对于非数字并购具有超额商誉,超额商誉对企业而言意味着不确定性与高风险。数字并购作为企业获取数据资源的一种重要途径,目的在于通过资产与资产交换、股权与资产交换等控制权转移的方式获取隐藏在企业年报中的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基于数据资源会计准则缺失,大量数据资源投入在当前会计准则下无法确认为资产,不断累积的“未入表”资源使企业费用和资产信息难以反映并购标的企业真实价值,买方可能要在并购标的账面价值的基础上支付大量溢价才能获取并购标的,这类溢价多以商誉的形式进行确认计量。而并购商誉因其特殊属性容易诱发企业风险:①并购商誉真实价值难于辨认与度量,是诱发内部人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滋生企业风险的重要源头^[38];②商誉资产减值法的会计处理方式导致商誉后续确认与计量滞后,加剧商誉资产信号的混乱程度,扩大金融风险^[39],是企业风险的重要诱因;③超额商誉会增加商誉减值概率,导致企业未来经营业绩“变脸”与波动,进而增加企业债务违约等企业风险^[40]。商誉的高风险导致管理层粉饰财务报表的动机增加,甚至采取违规、欺诈等手段掩盖风险^[41]。为此,审计师须执行更多必要的审计程序、配置数字技能人才组合以及投入更多的审计资源,来确保超额数字商誉初始计量、后续计量以及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将审计风险控制可容忍的范围内。另一方面,数字并购企业创新投入与创新风险增多,预示着审计面临更高的固有风险。数字并购战略意味着企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创

新。创新的高风险特性意味着高研发投入与未来盈利的不确定性息息相关^[19],容易诱发管理层舞弊、欺诈等粉饰报表的倾向。数字并购支付较高溢价,会进一步促使短期成本溢价与长期收益不对等,加剧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并购整合阶段需要将大量财力、人力资源投入数据资源移植与内化,但相应费用化处理会导致短期盈余急剧下降,加剧企业经营恶化可能性。同时,由于会计准则针对数据要素“进表”制度尚未全面客观实行,为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舞弊欺诈提供了可行性。这意味着审计师工作复杂性增加且审计师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来对企业创新价值进行判断,从而导致审计费用提升^[42]。

2. 数字并购会降低内部控制有效性,增加审计控制风险。内部控制有效性包括内部控制设计、运行的有效性^[37]。数字并购的核心驱动力和重要产出——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会使企业组织业务和内部控制体系产生突破性变革,降低内部控制设计与运行的有效性,这将增加审计工作的难度和成本。一方面,数字并购通过引入外部数字型企业商业模式为跨界经营提供机会,打破了组织边界。在数字情境下,刚性组织逐步被取代,人力、技术、资本要素在数据平台下可自由组合、随时解散,使组织内外边界日益模糊^[43]。数字并购标的企业集中在数字行业,数字技术与数据要素能够帮助企业实现平台化的商业模式与数字生态赋能,线上线下载融合打破时间和地缘限制,构建了平台联合价值链管理与生态网管理的“利益共同体”。尤其是数字行业内上下游的并购能使企业控股客户与供应商,将企业间竞争或合作关系改变为自我主导的企业群落,实现供应链交互协同,提升产品服务一体化,并以数据“液态”为联系,形成“虚拟集聚”与“产业生态”^[8],实现价值共创。企业价值共创主体边界远超内部控制边界并使企业的业务和组织结构处于快速变化之中。在此情形下,制度天然具有的滞后性决定了内部控制的反应速度无法适配企业边界扩张速度,导致新增风险不在内部控制覆盖范围之内,内控报告的可靠性和公允性难以保证,从而降低内部控制设计的有效性,审计控制风险增加^[37,44]。为此,审计师需要根据企业价值共创产业生态与产品一体化特征对价值链网络与供应链上下游的信息流和数据流实施重点审计,投入更多精力进行控制测试和实质性测试,确保企业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另一方面,数字并购合并了新业务、新组织与新人员,各种要素整合会降低内部控制有效性。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并购往往导致标的企业剩余控制权与激励机制消失,造成人员流动频繁。而在数字时代“赢者通吃”的市场格局下,大部分数字初创企业的发展目标本就是希望最终能够被大型企业合并,从而实现估值变现^[2],这会进一步加剧并后整合的企业人员流动。标的公司的数字技术能力及相关诀窍往往具有默会性、复杂性和人员嵌入性,数字人员流动会影响企业掌握快速诊断内部控制缺陷与自我评估的能力,影响建立数字情境下有效的内部控制环境。同时,企业合并新的数字业务模式与组织架构也使内部控制运行有效性大打折扣^[41]。尤其是数字技术“内部化整合”活动会引起更多非数字控制点的及时更新与不断完善,维护内部控制有效性的难度更大,而企业在短期内很难迅速调整人员、流程和技术以保持内部控制与公司发展的匹配,往往会出现“内控体系建设与信息化融合不够”“数据日志可读性差”“数据管理流于形式”等内控缺陷。面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不足,审计师需要耗费更长时间来评估和应对内部环境和信息系统产生的错报风险,从而增加审计成本与费用。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设 H_{1a} 。

H_{1a}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被审计单位数字并购会显著提升审计费用。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实现审计功能的方法与手段而言,企业数字并购作为数字发展的一种途径,具有重要的管理价值,能够赋能会计与审计方法和手段,使之更加智能与科学,提升会计职能实现程度,从而增强会计对企业价值运动过程的管理效果,减少审计师审计投入,降低审计收费。其一,企业数字并购与商业流程革新相伴而生^[1],并购资源有助于人力资源结构升级^[13]、提升企业市场势力^[8]和企业绩效^[11]。“数实融合”与财务协同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效率,从而降低被审计单位重大错报风险。其二,数字并购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7],进而提升公司治理水平,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影响审计师审计定价,降低审计费用^[32]。其三,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可赋能会计信息系统智能化,推动会计业务各个环节程序数字化,减少内部人对信息系统进行操纵的机会,降低出错概率,加强会计对企业价值活动的管理,抑制审计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从而提高审计效率,节约审计投入,降低审计费用。由此,假定可接受的审计风险与审计师能力不变,数字并购资源发挥管理价值能够降低被审计单位固有风险与控制风险,进而降低审计费用。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_{1b} 。

H_{1b}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被审计单位数字并购会显著降低审计费用。

四、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

本文以 2009—2022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并购事件为样本,考虑到金融行业会计项目与财务报表差异以及 ST 类或其他企业财务状况的异常性,剔除以下样本:(1)金融保险类;(2)ST 等“T”类;(3)财务数据缺失类。并购数据来源于 CSMAR 数据库中的并购重组子库,并进行了二次筛选,标准如下:第一,剔除交易失败并保留上市公司地位为买方的数据;第二,剔除资产置换、债务重组以及资产剥离的并购交易数据,并仅保留标的方为企业的样本;第三,剔除收购金额小于 100 万、股权收购比例小于 5% 的并购样本;第四,为排除多次并购的混合影响,对同一企业同一年份进行多次并购且并购标的不同的样本,保留买方支出金额最大的,标的相同则进行合并;第五,经过以上筛选后,根据数字并购判断标准确定数字并购交易。企业财务数据来自 CSMAR 与 CNRDS 数据库,主要连续变量在 1% 和 99% 水平上进行 Winsorize 处理,并使用 STATA17.0 完成实证检验。

(二) 变量定义与说明

1. 解释变量:数字并购(DMA)

本文借鉴陈奉先和杨亚迪的研究^[9],依据并购公告及“企查查”核对标的企业行业小类代码与企业信息,以《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为基准,逐一判断标的企业是否为数字经济行业划分的数字型企业,将对此类企业进行的并购行为视为数字并购。除此之外,为缓解标的公司注册行业信息误差与后续经营范围变更不一致对数字型公司判断的影响,借鉴李双燕和乔阳娇的研究^[13],以被并前五年内是否拥有数字专利、是否拥有软件著作权作为补充标准:①对于标的企业在被并前同时拥有数字技术专利与软件著作权,且其行业中类代码属于《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的企业视为数字型企业;②将企业行业小类代码符合《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但在并购前后不拥有数字技术专利与软件著作权的企业进行剔除。

2. 被解释变量:审计费用(Auditfee)

借鉴张永坤等、吴武清等的研究^[32-33],本文采用上市公司公开披露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衡量。

3. 控制变量

借鉴王稳华等的研究^[31],本文主要控制变量包括资产负债率(Lev)、企业规模(Size)、现金持有量(Cashflow)、成长机会(Growth)、公司年龄(Age)、无形资产占比(Intass)、独董比例(Indep)、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Shr1)、两职合一(Dua)、董事会规模(Board)、产权性质(Soe)、是否“四大”审计(Big4)、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变更(Change)以及审计意见类型(AuditOpi)。详细定义见表 1。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审计费用(Auditfee)	ln(公司公开披露的审计费用)
解释变量	数字并购(DMA)	企业是否进行数字并购,进行则取 1,否则为 0
控制变量	资产负债率(Lev)	总负债/总资产
	企业规模(Size)	ln(资产总额)
	现金持有量(Cashflow)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期末资产总额
	成长机会(Growth)	(本期营业收入 - 上期营业收入)/上期营业收入
	公司年龄(Age)	Ln(当年年份 - 成立年份)
	无形资产占比(Intass)	期末无形资产净额/期末资产总额
	独董比例(Indep)	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人数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Shr1)	第一大股东持股占比
	两职合一(Dua)	董事长兼任 CEO 时取值为 1;否则为 0
	董事会规模(Board)	董事数量
	产权性质(Soe)	国有企业取值为 1,否则为 0
	“四大”审计(Big4)	被国际“四大”审计则取 1,否则为 0
	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变更(Change)	变更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
审计意见类型(AuditOpi)	财报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	

(三) 主检验回归模型

由于不同被审计单位数字并购时间不同,本文借鉴唐浩丹等的研究^[8],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1)检验被审计单位数字并购对审计费用产生的影响。

$$Auditfee_{it} = \alpha_0 + \alpha_1 DMA_{it} + \alpha_2 \sum Controls_{it} + \varepsilon_{it} \quad (1)$$

模型(1)中,Auditfee 为审计费用,解释变量 DMA 表示被审计单位是否进行数字并购,若被审计单位未发生数字并购及发生数字并购之前年份则为 0,被审计单位进行数字并购及之后年份则为 1。下标 i, t 分别代表公司与年份。Controls 表示控制变量的集合。此外,本文为了进一步缓解公司个体特征、行业效应以及时间趋势等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控制了公司(ID)、行业(IND)、年份(YEAR)的固定效应,并对标准误在公司层面进行聚类稳健。本文主要关注 DMA 的估计系数 α_1 ,若该系数显著为正,则支持 H_{1a} ,否则支持 H_{1b} 。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显示,审计费用(对数)均值为13.8145,中位数为13.7102,最大值为16.2197,最小值为12.4292,表明审计费用数值符合正态分布假定,且在不同公司之间差异较大。数字并购DMA的均值为0.0418,表明受到数字并购行为影响的样本观测值占比为4.18%,符合已有研究取值范围且有较大增长空间,也为探究数字并购与企业审计费用的影响差异奠定了基础。其他变量与已有研究相比基本一致且均处于合理区间之内。

(二)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根据上述检验流程对模型(1)进行回归并在表3中报告结果。其中,列(1)在未控制任何变量下显示被审计单位数字并购对企业审计费用具有正向影响;列(2)在增加相关控制变量后,DMA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列(3)进一步控制个体、行业与时间固定效应,DMA的估计系数为正且显著。上述结果使假设H_{1a}得以验证,表明数字并购对于被审计单位而言具有一定风险与成本冲击,审计师能够识别这一冲击带来的风险并付出更多审计努力。同时也印证数字情境下数字技术发展给审计工作带来了相关挑战,为秦荣生^[4]等学者提出数字发展阶段审计工作设想的规范研究提供了实证证据支撑。

六、稳健性检验

(一)基于匹配后样本的实证检验

样本选择偏差可能导致内生性问题,被审计单位数字并购与非数字并购经过匹配之后能有效克服样本之间的系统性偏差,估计结果更为稳健。本文以1:1卡尺最近邻匹配后的样本进行相应检验,结果如表4第(1)列所示。此外,为克服处理组样本数量远少于潜在对照组样本数量时存在的抽样方差影响,本文借鉴唐浩丹等^[8]的研究,采用1:4的“一对多”卡尺最近邻匹配策略以增强匹配效力并再次进行检验,结果如表4第(2)列所示,研究结论较为稳健。

(二)安慰剂检验

考虑到遗漏变量与随机因素可能会对稳健性检验结果产生影响,本文以随机分配处理组样本与发生时间进行安慰剂检验,最终以伪核心解释变量DAM^{random}替代式(1)中的DMA进行回归。图1为500次随机抽样 α_1^{random} 的核密度以及P值分布图,结果显示 α_1^{random} 主要集中于零附近并呈正态分布,P值绝大多数都高于0.1。此外,随机估计系数基本位于真实估计结果0.0807左侧,表示本文真实估计结果属于抽样估计结果中的明显异常值,结果稳健。

(三)动态效应分析

双重差分结果满足一致性的重要前提在于组别之间的平

表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Mean	Median	SD	Min	Max	观测值
Auditfee	13.8145	13.7102	0.7053	12.4292	16.2197	33772
DMA	0.0418	0.0000	0.2002	0.0000	1.0000	33772
Lev	0.4296	0.4198	0.2096	0.0533	0.9488	33772
Size	22.1837	22.0076	1.3128	18.9417	26.1503	33772
Cashflow	0.1864	0.1501	0.1341	0.0129	0.6986	33772
Growth	0.1729	0.1077	0.4241	-0.5850	2.7799	33772
Age	2.8334	2.8904	0.3680	1.6094	3.4965	33772
Intass	0.0459	0.0334	0.0496	0.0000	0.3267	33772
Indep	37.5093	35.7100	5.2900	33.3300	57.1400	33772
Shr1	33.9760	31.7450	14.8762	8.5000	75.0000	33772
Dua	0.2766	0.0000	0.4473	0.0000	1.0000	33772
Board	8.5515	9.0000	1.6407	5.0000	14.0000	33772
Soe	0.3649	0.0000	0.4814	0.0000	1.0000	33772
Big4	0.0573	0.0000	0.2324	0.0000	1.0000	33772
Change	0.1111	0.0000	0.3143	0.0000	1.0000	33772
AuditOpi	0.0349	0.0000	0.1836	0.0000	1.0000	33772

表3 被审计单位数字并购与审计费用

变量	(1) Auditfee	(2) Auditfee	(3) Auditfee
DMA	0.1761 *** (9.1951)	0.0523 *** (4.4498)	0.0807 *** (3.1430)
Controls	No	Yes	Yes
ID&IND&YEAR	No	No	Yes
N	33772	33772	33772
Adj. R ²	0.0025	0.6299	0.6664

注: *、**、*** 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显著,括号内为T值;下表同。

表4 匹配样本后回归结果

变量	(1) Auditfee	(2) Auditfee
DMA	0.0757 *** (2.8194)	0.0787 *** (3.1906)
Controls	Yes	Yes
ID&IND&YEAR	Yes	Yes
N	5006	11283
Adj. R ²	0.7289	0.68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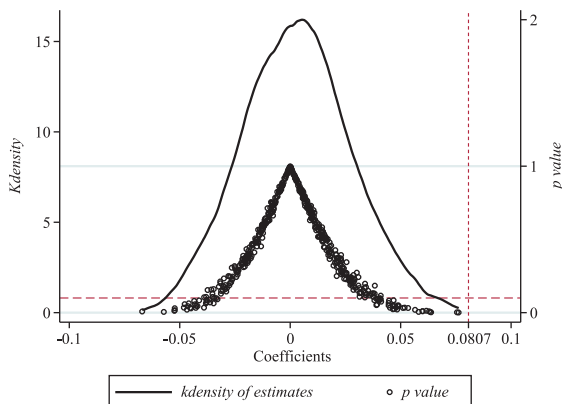


图1 安慰剂检验概率密度分布

行趋势假设。同时,考虑伴随数字并购整合完成,外来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与自身内部要素的替换、协同和融合,被审计单位固有风险、控制风险应趋于平缓,数字并购对企业审计费用的影响理应逐渐消除。而主回归结果是被审计单位数字并购行为对审计费用的平均处理效应,未能有效反映数字并购完成后的动态结果。为此,本文借鉴唐浩丹等^[8]的研究,以事件研究法纳入数字并购前后相对年份信息,以此拓展得出动态 DID 模型(2)。

$$Auditfee_{it} = \beta_0 + \sum_{j \neq -1} \beta_j DMA_{i,t+j} + \alpha_0 \sum Controls_{it} + \varepsilon_{it} \quad (2)$$

模型(2)中,下标 j 表示事件发生的相对年份,如 $j = -1$ 则意味着数字并购事件前一年,所以根据基准回归模型变量定义, $DMA_{i,t+j}$ 是以数字并购完成年份 t 为基准年,数字并购完成前后的第 j 年($t+j$) 为 1, 否则为 0, 从而使平均处理效应分解到不同年份,并以并购前一年($j = -1$) 作为比较基准。此外,根据本文数字并购前后 6 年及以上年份观测值较少的特征,本文借鉴 Li 等的^[45] 研究,合并这一部分观测值进行检验,以克服其对回归结果造成有偏估计的影响。

式(2)回归结果如图 2 所示,数字并购事件发生前($j \leq -2$) 变量 DMA 的系数 β_j 均不显著且变化趋势基本平稳,意味着处理组和对照组在数字并购发生之前不存在明显差异,满足平行趋势假设。然而,数字并购估计系数 β_j 在并购完成及之后四年内($j = 0, 1, \dots, 4$) 呈现显著递增趋势,表明被审计单位数字并购能显著提升审计费用。但长期($j = 5, 6 +$) 来看,数字并购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会逐渐降低并不再显著,意味着数字并购对企业审计费用的影响会随着并购整合而趋于消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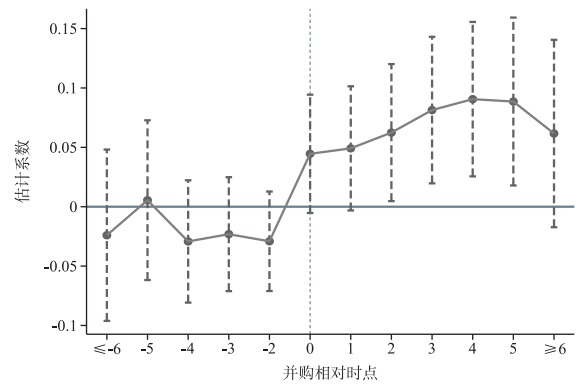


图 2 动态效应

(四) 其他稳健性检验

① 更换被解释变量。采用审计费用除以总资产进行审计费用的替换性衡量,并在此基础上乘以 10000 以保证估计系

数值的可读性;② 更换核心解释变量。

以数字型企业行业小类代码符合《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为基准判断数字并购,将以补充标准判断的数字并购样本分别进行删除与替换为对照组两种方式重新回归,结果如表 5 列(2) 和列(3) 所示;③ 为避免 2014 年企业会计基本准则以及多

项企业会计准则修订前后差异对审计师决策的影响,将样本区间缩短为 2014—2022 年;④ 考虑样本期间内,2015 年中国并购浪潮、2020 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能影响并购决策,从而对回归结果不利,本文借鉴马慧和陈胜蓝的研究^[46],剔除以上特殊时期样本;⑤ 改变回归方法。Bootstrap 相比公司聚类的统计推断更为保守,本文采用 Bootstrap($k = 5000$ 次) 稳健性标准误再次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被审计单位数字并购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均显著为正,研究结论稳健。

表 5 其他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更换被解释变量	更换解释变量	更换解释变量	缩短样本期间	剔除特殊样本期	改变回归方法
	<i>Auditfee</i>	<i>Auditfee</i>	<i>Auditfee</i>	<i>Auditfee</i>	<i>Auditfee</i>	<i>Auditfee</i>
<i>DMA</i>	0.1984 ** (2.4936)	0.0809 *** (2.6115)	0.0805 *** (2.5969)	0.0960 *** (3.6247)	0.0774 *** (2.9494)	0.0807 *** (3.1644)
<i>Controls</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ID&IND&YEAR</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i>	33772	32927	33772	25334	28405	33772
<i>Adj. R²</i>	0.5235	0.6649	0.6662	0.5310	0.6759	0.6253

七、机制路径检验

基于前文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被审计单位进行数字并购会显著提升审计费用,主要在于被审计单位数字并购给审计带来更高的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审计师为了将风险控制在可容忍水平内付出了更多审计努力。因此,本文借鉴江艇的研究^[47],构建模型(3) 进行机制路径检验。

$$Zscore_{it}/AuditInter_{it}/AuditEffort_{it} = \delta_0 + \delta_1 DMA_{it} + \delta_2 \sum Controls_{it} + \varepsilon_{it} \quad (3)$$

其中, $Zscore$ 为审计的固有风险,借鉴陆明和杨德明的研究^[37],采用阿特曼提出的 Z 值进行衡量, $Zscore$ 越小说明固有风险越高; $AuditInter$ 为审计控制风险,借鉴 Demirkan 和 Zhou 的研究^[48],采用上市公司是否收到非

标准的内控审计意见衡量, *AuditInter* 为 1 意味着被审计单位被出具非标准内控审计意见, 内部控制缺陷说明审计控制风险高, 否则 *AuditInter* 为 0; *AuditEffort* 为审计师审计投入, 借鉴洪金明等的研究^[49], 使用企业会计年度结束日至次年审计报告出具日间隔天数的自然对数衡量。

表 6 是机制检验结果。表 6 第(1)列 *DMA* 的估计系数显示, 公司数字并购行为会显著提升审计固有风险; 列(2) *DMA* 的估计系数表明, 实施数字并购会显著提升公司审计控制风险; 列(3) *DMA* 的估计系数证明, 数字并购企业审计师审计投入增加。上述机制检验结果证实前文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的合理可靠。

表 6 被审计单位数字并购影响审计费用的机制检验

变量	(1) <i>Zscore</i>	(2) <i>AuditInter</i>	(3) <i>AuditEffort</i>
<i>DMA</i>	-0.2649 ** (-1.9661)	0.3615 ** (2.4074)	0.0224 ** (2.1858)
<i>Controls</i>	Yes	Yes	Yes
<i>ID&IND&YEAR</i>	Yes	Yes	Yes
N	33772	29062	33772
Adj. R ² /Pseudo R ²	0.3929	0.2411	0.1647

八、异质性检验

(一) 基于被审计单位企业类型的异质性分析

1. 数字与非数字企业属性的异质性

被审计单位企业类型会显著影响数字并购与企业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 非数字经济企业进行数字并购的主要目的在于利用标的企业数字资源发展自身数字能力, 实现商业模式嬗变, 本质属于跨界并购, 其借助数字资源能够在构建自身数字能力的同时, 也使其传统业务边界与组织边界趋于模糊化和平台化, 自身经营革新程度更高, 相应风险也就愈大。相比非数字经济企业, 数字经济企业从创建之初, 其主营业务就是为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数字技术、产品、服务、基础设施和解决方案, 以及依赖于数字技术、数据要素的各类经济活动, 其数字并购目的在于获取相关技术和市场, 本质是同界并购, 前期业务边界和组织边界能够更好地容纳标的企业数字资源, 风险相对温和。因此, 数字并购这一外部冲击行为对两类企业的影响程度不同, 进而会导致并购后审计费用变化程度差异。本文依据《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将样本划分为是否数字经济核心产业^①, 表 7 中列(1)和列(2)显示,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内企业相比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内企业, 其数字并购行为并不能显著影响审计费用, 印证非数字经济企业数字并购会让审计工作面临更高的风险与成本。

表 7 被审计单位数字并购影响审计费用的异质性检验

变量	(1) 非数字经济企业 <i>Auditfee</i>	(2) 数字经济企业 <i>Auditfee</i>	(3) 非数字化背景高管 <i>Auditfee</i>	(4) 数字化背景高管 <i>Auditfee</i>	(5) 非“四大”事务所 <i>Auditfee</i>	(6) “四大”事务所 <i>Auditfee</i>	(7) 审计师行业专长低 <i>Auditfee</i>	(8) 审计师行业专长高 <i>Auditfee</i>
<i>DMA</i>	0.1337 *** (3.5053)	0.0104 (0.3166)	0.0961 *** (3.3442)	0.0421 (0.7447)	0.0803 *** (3.0630)	-0.0580 (-0.4570)	0.1046 *** (3.3107)	0.0609 (1.2179)
<i>Controls</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ID&IND&YEAR</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22422	6074	30190	2616	31838	1934	16886	16886
Adj. R ²	0.6773	0.6854	0.6702	0.5894	0.6682	0.4292	0.5249	0.6922

2. 企业高管团队数字化背景的异质性

被审计单位高管团队职业背景会显著影响数字并购与企业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 过往的求学背景、成长特征会促使高管在相应领域积累专门知识并形成深刻的烙印, 成为影响其认知能力和决策取向的重要因素。作为一种专业认知、技能与社会网络烙印, 高管团队成员所具有的数字背景首先能够帮助企业在并购数字型企业时有效识别标的价值, 缓解信息不对称与“暴雷”风险, 从而降低审计固有风险。其次, 高管团队数字职业背景能使其更好地掌握并购标的数字资源与自身资源的融合程度, 识别内部控制薄弱点并进行针对性强化, 提升内部控制设计与运行的有效性, 降低审计控制风险。最后, 数字背景高管针对审计中存在的信息系统风险识别点能够更容易与审计师进行沟通, 以此减少审计师疑虑和非必要审计程序, 降低审计成本。本文借鉴王超等研究^[50], 以上市公司董监高高管团队所学专业信息构建高管数字化背景的虚拟变量, 以此对样本企业进行

①为突出“数字产业化”天然数字属性, 剔除样本中“05 大类产业数字化”部分企业。

分组,表 7 中列(3)和列(4)显示,高管团队数字化背景组别中被审计单位数字并购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并不显著,证明高管数字化背景会减少由被审计单位数字并购引起的高收费决策行为。

(二)基于会计师事务所类型的异质性分析

1. 四大与非四大的异质性

会计师事务所类型会显著影响数字并购与企业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国际“四大”依赖其全球化的市场、先进的信息技术和优秀的人才储备,在数字化审计领域的探索处于领先地位,率先将“数据先行”理念以及尖端科技融入审计实务。大数据分析 with 机器人流程自动化等“审计智能+”技术较为领先,相比本土会计师事务所能更好地适应企业数字应用趋势^[33]。例如,德勤已于 2017 年公开推出人工智能产品“德勤财务机器人”;同年,普华永道推出 GL.ai 利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对业务进行“X 光检测”,革新对舞弊和错报的识别。相比较而言,我国本土事务所面对数字浪潮的反应较为缓慢,面对被审计单位的数字并购行为冲击需要付出更多的审计努力和更高的反应成本,审计费用溢价更高。本文将样本划分为是否为国际“四大”审计,表 7 中列(5)和列(6)显示,国际“四大”对被审计单位数字并购行为收取的溢价并不显著,意味着审计单位较早、较高程度开展数字审计业务建设能够更好地适应被审计单位数字并购所带来的审计风险。

2. 审计师行业专长的异质性

审计师行业专长会显著影响数字并购与企业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在面对被审计单位数字并购产生的风险时,行业专长程度高的审计师会利用自身专精知识为客户提供更好的风险管理咨询服务,帮助数字并购企业采取精准策略降低数字控制权转移与企业合并所带来的风险,从而降低审计努力程度。同时,行业专长较高的审计师往往具有更高的审计技能、更丰富的行业经验与专业知识,能够帮助自身在对数字并购企业审计时高效地执行审计程序,提高审计效率,进而降低审计投入。相比而言,行业专长较低的审计师在专业知识、行业经验以及抵御执业风险方面的能力有所不足,面对数字并购企业新业务的风险敏感性较高,为了保证审计质量,行业专长较低的审计师会执行更多的审计程序与审计投入,致使审计成本增加。本文借鉴王稳华等的研究^[31],以行业市场份额衡量审计师的行业专长,以其中位数将样本企业分为行业专长高、低两组,回归结果如表 7 列(7)和列(8)所示,在审计师行业专长较高组中,被审计单位数字并购对审计费用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说明较高的审计师行业专长会减少被审计单位数字并购所引起的高收费决策行为。

九、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数字并购是获取数字技术与数据资源的重要途径,具有数字革新价值,但也存在相应风险,并对审计工作产生影响。本文基于审计定价视角,实证检验被审计单位数字并购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作用机制和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对于进行数字并购的被审计单位,审计师会收取更多的审计费用以应对潜在的审计风险。机制检验发现,被审计单位数字并购会增加审计的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审计师需要增加审计投入以降低审计风险,从而影响审计费用。异质性检验发现,相比数字经济公司与数字化背景高管团队,非数字经济公司与不具有数字化背景高管的公司进行数字并购的风险与成本更大,更容易导致审计师收取更高审计费用。另外,较早、较高程度开展数字审计业务建设的国际“四大”审计以及行业专长程度高的审计师能够有效减少数字并购引致的审计费用高的决策行为。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对于上市公司而言,需要考虑企业数字发展面临的成本与收益权衡问题。数字并购行为能够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和价值创造,也会面临着较大的控制权转移成本和企业合并风险,尤其是在跨界并购、高管团队不具有数字化背景、会计师事务所数字应对能力较低以及审计师行业专长较低的情况下。因此,上市公司要加强自身外来资源消化吸收能力、培养数字化人才、加强与审计师之间的信息沟通协作或聘请行业专长较高的审计师,以便企业更好地规避数字并购控制权转移和企业合并风险,缩减相关审计成本。其次,对于审计机构而言,审计师要具备必要的数字技术知识和技能,转变审计思路,加强对信息技术的学习,努力掌握和了解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相关知识,强化内部控制评估,优化数据处理和分析过程,合理客观评估客户公司数字并购与数字化发展对经营发展产生的影响及可能带来的风险,提高审计工作针对性,保证审计质量和效率。最后,对于制度制定者而言,应以数字经济发展为契机,积极评估其对会计、审计环境的影响。在会计制度修订完善方面,进一步推动会计对象数字资产产权明晰与确认计量工作,使会计信息能够充分

明晰企业数字要素资产界定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在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方面,要提升内部控制与数字技术适配能力建设,提升内部数据信息系统与业务流程契合程度,加强对数字组织结构、数字能力与数据伦理等风险点的识别与控制。

本文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第一,本文仅考虑了上市公司数字并购研究,对于大量非上市公司群体的研究关注不足;第二,虽然现有研究多采用企业行业信息与国家统计局标准相匹配的方法进行数字并购识别,且本文在此基础上增加数字专利与软件著作权作为补充标准,但受限于多数并购标的为非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不完善,可能会导致些许数字并购行为界定偏差与潜在忽视;第三,没有探究公开数据较少的标的公司审计费用的变化。未来可从以下几个方向深入研究: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研究,拓展非上市公司大样本研究;增加公司公开披露的营收数据作为识别标准,交叉综合判断数字化并购行为;基于目标公司视角,关注并购标的公司控制主体变更、管理层改组及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资源配置差异等对标的公司审计费用的影响与机制。

参考文献:

- [1] Hanelt A, Firk S, Hildebrandt B, et al. Digital M&A, digital innov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 *Europea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ystems*, 2021, 30(1): 3-26.
- [2] 唐浩丹, 蒋殿春. 数字并购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内涵、事实与经验[J]. *经济学家*, 2021(4): 22-29.
- [3] 徐玉德. 数字经济时代会计变革的反思与逻辑溯源[J]. *会计研究*, 2022(8): 3-13.
- [4] 秦荣生. 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对审计的影响研究[J]. *审计研究*, 2014(6): 23-28.
- [5] 杨德明, 夏小燕, 金淞宇, 等. 大数据、区块链与上市公司审计费用[J]. *审计研究*, 2020(4): 68-79.
- [6] 方森辉, 唐浩丹, 蒋殿春. 数字并购与企业创新——来自中国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J]. *管理科学*, 2022(6): 83-96.
- [7] 伍晨, 张帆. 数字并购、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J].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2023(3): 21-38.
- [8] 唐浩丹, 方森辉, 蒋殿春. 数字化转型的市场绩效: 数字并购能提升制造业企业市场势力吗?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2(12): 90-110.
- [9] 陈奉先, 杨亚迪. 数字并购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J]. *管理学报*, 2024(8): 1142-1151.
- [10] Tang H, Fang S, Jiang D. The market value effect of digital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Evidence from China[J]. *Economic Modelling*, 2022, 116(11): 1-17.
- [11] 刘玉斌, 张贵娟, 徐洪海. 数据规模、数据范围与平台企业绩效——基于数字平台并购视角[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4(3): 131-152.
- [12] 刘玉斌, 张贵娟, 张博文. 数据驱动型并购提升了数字平台经济绩效吗? [J]. *财经研究*, 2024(3): 33-48.
- [13] 李双燕, 乔阳娇. 数字并购的市场效应——基于创新与垄断的视角[J]. *经济管理*, 2023(10): 49-69.
- [14] Simunic D A. The pricing of audit services: Theory and Evidence[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980, 18(1): 161-190.
- [15] 王晓亮, 王荻, 蒋勇. 高管团队学历异质性、真实盈余管理与审计收费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19(9): 175-184.
- [16] 徐鹏, 宋方杰, 柳岩. 连锁董事如何影响上市公司审计费用? ——基于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24(5): 21-30.
- [17] 张心灵, 赵渊寰, 范文娟. 生物资产是否影响审计收费? ——基于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20(4): 28-37.
- [18] 陈玥, 江轩宇. 会计信息可比性能降低审计收费吗? ——基于信息环境与代理问题的双重分析[J]. *审计研究*, 2017(2): 89-97.
- [19] 李秀丽, 张琳琅, 李岩琼. 企业创新与审计费用[J]. *会计研究*, 2023(6): 167-178.
- [20] 黄世忠, 叶钦华, 陈雪颖. 隐性关联关系与审计费用——基于供应链工商大数据的研究[J]. *审计研究*, 2024(2): 73-86.
- [21] Gong Q, Li O Z, Lin Y, et al. On the benefits of audit market consolidation: Evidence from merged audit firm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6, 91(2): 463-488.
- [22] 宋子龙, 余玉苗. 审计项目团队行业专长类型、审计费用溢价与审计质量[J]. *会计研究*, 2018(4): 82-88.
- [23] 程璐, 陈宋生. 审计市场供需不平衡、事务所选聘与审计收费[J]. *会计研究*, 2016(5): 87-94.
- [24] 王莉莉, 刘媛媛. 审计师—客户匹配度、审计师变更与审计费用[J]. *审计研究*, 2018(2): 64-71.
- [25] 蔡春, 鲍瑞雪, 王朋. 并购审计师与年报审计师匹配关系对年报审计费用的影响——基于会计师事务所网络中心度视角的分析[J]. *会计研究*, 2024(1): 164-178.
- [26] 朱晓文, 王兵. 国家审计对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与审计收费的影响研究[J]. *审计研究*, 2016(5): 53-62.
- [27] 许静静, 朱松, 周萍. A 股关键审计事项全面披露特征及政策效果研究——基于 2018 年首次全面披露的分析[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9(6): 46-57.
- [28] 林朝南, 张允萌. 新收入准则会影响审计费用吗? ——来自 A+H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 2024(4): 23-33.
- [29] 沈烈, 王浩然. 市场结构、地方保护与异常审计费用[J]. *中国软科学*, 2024(6): 202-213.
- [30] 吴芃, 张晶, 顾焱焱, 等. 媒体负面报道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影响研究——以新浪微博为例[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22(5): 33-42.
- [31] 王稳华, 裴璇, 聂兴凯. 被审计单位人工智能应用对审计投入和审计费用的影响[J]. *审计研究*, 2024(3): 102-112.
- [32] 张永坤, 李小波, 邢铭强.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审计定价[J]. *审计研究*, 2021(3): 62-71.
- [33] 吴武清, 赵越, 苏子豪. 企业信息化建设与审计费用——数字化转型时期的新证据[J]. *审计研究*, 2022(1): 106-117.
- [34] DeFond M, Zhang J Y. A review of archival auditing research[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14, 58(2-3): 275-326.

- [35] 高翀,石昕,刘峰.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审计师决策[J]. 管理科学,2023(3):116-129.
- [36] Kuang Y F, Lee G, Qin B. Whistleblowing allegations, audit fees, and internal control deficiencies[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21, 38(1): 32-62.
- [37] 陆明,杨德明. 跨界投资与上市公司审计费用[J]. 审计研究,2023(5):134-146.
- [38] Ramanna K, Watts R L. Evidence on the use of unverifiable estimates in required goodwill impairment[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012, 17(4): 749-780.
- [39] 李明,彭川. 商誉理应减值还是摊销?——兼评 IASB《讨论稿》[J]. 会计研究,2021(1):26-43.
- [40] 张治锋. 超额商誉与债务违约:业绩波动的信号效应研究[J].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22(6):51-71.
- [41] Bentley-Goode K A, Newton N J, Thompson A M. Business strategy, internal control over financial reporting, and audit reporting quality[J].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2017, 36(4):49-69.
- [42] 步丹璐,吴霞,连军,等. 企业创新与审计定价[J]. 审计研究,2020(4):102-112.
- [43] 黄世忠. 新经济对财务会计的影响与启示[J]. 财会月刊,2020(7):3-8.
- [44] Doyle J, Ge W, McVay S. Determinants of weaknesses in internal control over financial reporting[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7, 44(1-2):193-223.
- [45] Li P, Lu Y, Wang J. Does flattening government improve economic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6(123):18-37.
- [46] 马慧,陈胜蓝. 企业数字化转型、坏消息隐藏与股价崩盘风险[J]. 会计研究,2022(10):31-44.
- [47] 江艇. 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J]. 中国工业经济,2022(5):100-120.
- [48] Demirkan S, Zhou N. Audit pricing for strategic alliances: An incomplete contract perspective[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2016, 33(4):1625-1647.
- [49] 洪金明,林润雨,崔志坤. 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审计投入与审计意见[J]. 审计研究,2021(3):96-105.
- [50] 王超,余典范,龙睿.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数字化——垫脚石还是绊脚石? [J]. 经济管理,2023(6):79-100.

[责任编辑:刘 茜]

The Impact of Digital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on Audit Fees

LI Ming¹, WANG Wei¹, ZUO Jingjing²

(1. Chinese Academy of Fiscal Sciences, Beijing 100142, China; 2. Business School,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way to obtain digital technology and data resources, digital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have the value of digital innovation and corresponding risks, which will have an impact on audit work. This paper selects the merger and acquisition events of non-financial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s A-share market from 2009 to 2022 as samples, and uses audit fees as the starting point to empirically test how digital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ffect audit work and pricing decis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gital M&A of the auditee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audit cost, which is still significant after considering the endogenous and robustness issues, which means that the digital M&A of the auditee may increase the auditor's perceived audit risk and increase the audit cost. Mechanism testing found that digital M&A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inherent and control risk of the audited entity, and auditors will correspondingly increase their audit investment, thereby affecting audit pricing decisions. Heterogeneity testing found that when the audited entity is a digital economy enterprise, the executive team has a digital background, hires international "Big Four" accounting firms for auditing, and has high expertise in the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 industry, the positive impact of digital M&A on audit fees is not significan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other side" of enterprise digital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udit fees, improves the research on the risk and cost of digital M&A, and enriches the innovative research of the current audit system in the new digital context.

Key Words: digital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udit fees; digital technique; data resources; inherent risk; control risk; audit investment